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加快培育长株潭现代化都市圈

李晖

核心提示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扎实有序推进长株潭现代化都市圈培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推动同城化程度达到更高水平,让长株潭都市圈更具厚度、更显亮度、更有温度。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作出战略部署。为贯彻执行国家新型城镇化行动计划,湖南省政府日前印发了《湖南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通过提升城际交通互联,强化产业分工协作、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使得长株潭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辐射带动力进一步增强,这为长株潭都市圈发展确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加快培育长株潭现代化都市圈的重大意义

从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看,单体城市发展向都市圈化的演进是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必经过程。长株潭都市圈不仅是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长株潭现代化都市圈的培育不仅是湖南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更是推动全省乃至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规律使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长株潭三市携手打造现代化都市圈,为湖南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契机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3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1.16%,与全国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城镇体系朝着更加协调、均衡的方向发展。培育长株潭现代化都市圈,不仅能够提升长沙作为省会城市的核心地位和综合功能,更辐射带动了洞庭湖、湘南、湘西地区的经济崛起,有效应对了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可以促进区域内的株洲和湘潭借势长沙、服务长沙、融入长沙,充分利用长沙的资源和市场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资源共享与产业链对

加快培育长株潭现代化都市圈的重大任务

扎实有序推进长株潭现代化都市圈培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推动同城化程度达到更高水平,让长株潭都市圈更具厚度、更显亮度、更有温度。

提升城际交通互联是推进都市圈培育的基本前提。现代化都市圈是以城市群内部超大特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打造1小时交通圈,往往被视为都市圈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些年,长株潭都市圈路网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与其他都市圈比,仍然相对落后。2022年,长株潭都市圈的公路总里程为3.18万公里,在13个都市圈中排名第10,仅为郑州市都市圈的1/3,武汉市都市圈的1/2;其公路密度为1.68公里/平方公里,在13个都市圈中排名第6。要以增强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为重点,织密网络、优化方式、畅通机制,加快完善都市圈公路和轨道交通网,建设“轨道上的长株

潭”,进一步提高都市圈通勤和物流效率。

强化产业分工协作是推进都市圈培育的核心内容。专业化分工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和核心动力,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和经济活动都不是一个封闭主体独立完成的,必须依赖高效的产业分工协作,其广度和深度都直接影响都市圈建设的质量与成效。如果没有产业分工协作,都市圈就是一个相互割裂的城市个体,现代化都市圈也就无从谈起。长久以来,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既有辐射作用,又存在虹吸效应。必须正确处理好都市圈中心城市与都市圈内其他区域的关系,支持长沙探索特大城市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模式,发挥长株潭各地理单元的比较优势,引导都市圈内部错位发展,更好形成各具特色、布局合理、协同高效的都市圈产业分工协作体系。

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是都市圈培育的必由之路。市场一体化建设是一个打破行政壁垒、强化经济区经济的过程,而都市圈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了行政界限的特殊空间单元,市场一体化建设内蕴于心、外显于行,是都市圈“破圈”“扩圈”的必由之路。当前,如何破解都市圈内部利益矛盾与冲突是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的难点所在。必须进一步强化要素“源头活水”意识,深入推进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实现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资源环境等要素市场的全面对接和深度融合,推进市场准入“异地同标”,确保企业在

植根优秀传统文化, 培塑公安警魂

尹携携

公安机关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专门力量,肩负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重大政治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新时代人民警察履行职责指明了前进方向,“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是价值原则、政治品质、理想信念,是人民警察的警魂。培塑警魂,有力提升公安新质战斗力,是现代公安教育必须完成的使命。

植根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多次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也为公安培塑警魂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公安教育可以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找到资源和营养。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悠久历史岁月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是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强调通过实践、忠诚、诚信等具体行为要求,将学生培养成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儒家教育思想,经过现代人的努力发

掘和创新诠释,在各领域均可以作出相应的回应。现代公安的回应就是培塑“忠诚、为民、公正、廉洁”警魂。儒家文化中有大量与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有关的元素,公安教育教学恰当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元素,将润物细无声地促进培塑警魂。

塑造多维度育人场域。公安院校是公安队伍建设的源头和人才培养基地,自然也是培塑警魂的重要阵地。在青年学警立志从警的“拔节孕穗期”,公安院校必须对其做好筑根基、砺警魂工作,将青年学警培养成能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人民的合格警察,不能将警魂教育视为思政课这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各学科教师都肩负培塑警魂的重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各学科教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起创设有效环境,使环境成为培塑警魂的自觉手段,充分发挥其促进青年学警健康成长的作用。湖南警察学院各学科植根传统文化培塑公安警魂教育工作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治安系教师在《治安案件查处》课程中,用杜甫的诗《又呈吴郎》启发学生如何用巧妙的语言艺术,完美解决群众纠纷;基础学科高数教师讲授数列的极限时,通过介绍战国时期名著《庄子·天

下篇》里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名言,既让学生从优美的古文中体会极限的数学思想,也让学生认识到生命虽有限,但我们可以追求无限的知识、智慧和客观真理。教师通过深入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爱民、公正等好品质。

培塑警魂教育要走出校园,加强院局合作。基于实战性、应用性是公安教育的突出特点,现在全国各地公安院校都非常重视与公安实践业务部门的合作,但更多偏重公安具体业务合作。为切实加快形成和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院局不仅应该在公安业务上合作,也应重视在培塑警魂方面的合作。教师多途径多角度深入基层公安业务部门,通过专题调研、挂职锻炼、案件会诊等方式参与一线警务工作,从公安具体工作中找到如何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为课堂教学提供育人的教学新思路;公安院校中不乏传统文化学术造诣高的教师,公安机关就本单位现状和实际需要,可请相关教师为公安一线工作人员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将公安培塑警魂教育阵线深拓至公安实战一线,这样,不仅帮助青年学警打好从警第一粒扣子,也让所有警

察能随时审视自己的警容风纪。

提升教师传统文化修养。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只有教师整体文化素养提升,才能保证植根优秀传统文化培塑公安警魂工作顺利进行。公安院校学科繁多,并不是每位教师都拥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养,为让教师在授课时能巧妙挖掘传统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公安院校应通过教学科学安排、集体备课、培训交流等途径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文化素养,不断增强教师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储备,提高教学设计能力,促进公安业务教学与培塑警魂教育的完美融合。

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期,各类矛盾集中出现,公安工作面临着复杂严峻的挑战,“铸魂”与“蛀魂”的较量日趋尖锐。公安教育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营养,将高质量完成培塑警魂工作,为扎实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公安力量。

【作者系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湖南2024年全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公安院校大学语文培塑警魂意识视域下文本解读教学的探索与实践”(202401001691)阶段性成果】

促进文旅融合须树立正确审美导向

岳洋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文化的力量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新疆阿勒泰到大同云冈石窟,再到临汾小西天,这些地方凭借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和游戏《黑神话:悟空》成为热门打卡点。然而,也不可忽视文旅融合过程中,某些宣传手段迎合了低俗、庸俗的审美癖好,虽然一时之间吸引了大量关注并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却在根本上削弱了地方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以全红婵的家乡为例,她的夺冠和家乡美景本应成为文化旅游的亮点,但无孔不入的直播和围观打卡却让当地的乡土文化和全红婵所代表的奋斗精神被噪音所淹没。再如游戏《黑神话:悟空》引发了各地文旅部门对“悟空”形象的“认亲”热潮,但宣传形式上的千篇一律及过度的商业化却使“悟空”形象失去原有的英雄价值和文化内涵。这些短视的宣传策略,虽可能在短期内吸引眼球,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审美导向,也会损害文化旅游的真正价值。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坚持正确的审美导向,促进文旅融合的健康发展。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正确的审美观绷紧文旅融合的意识形态之弦。文旅融合不仅

是经济活动,更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深度交融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当下,旅游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是价值塑造的重要途径。而旅游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它不仅丰富游客的感性认识,而且能潜移默化地增强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将审美作为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工具植入文旅融合中,不仅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而且还能有效纠正文旅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防止“流量至上”的负面现象无序蔓延。在文化生产日益多样化、数字化、流量化的今天,应坚持文旅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通过弘扬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审美导向,确保文旅融合的健康发展,为人民提供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引领社会风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必须服从社会价值,以切实履行文化产业的“守正”职责。

提供审美价值标尺,提高人们辨别美丑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在文艺创作中分辨美丑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文旅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美与丑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基本的审美原则却是永恒的。真正的美能陶冶情操,而低俗、庸俗和媚俗的东西,只会腐蚀人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在文旅融合中提升分辨美丑的能力看似是一个审美问题,其背后更涉及价值伦理、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缠绕与交错。从社会风气的角度来看,将低俗化和媚俗化的宣传将助长社会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些庸俗的文旅营销策略会污染文化环境,挤压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空间。如果任由低俗审美泛滥,就会导致文化生态失衡。因此,一方面,应培育文旅行业从业者乃至全社会的感知能力、情感能力,提升其分辨、评价和创造文旅产品审美品质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培养人们鉴别“高尚”与“卑劣”的能力,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是非观,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之风,共同维护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

勇于开展审美批判,旗帜鲜明地抵制消极审美。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为旅游体验

带来了多样化和丰富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审美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促进了文化交流和融合,却也可能引发审美混乱。后者不仅是一个审美问题,更折射出深层次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面对文旅融合中的种种审美乱象,我们不仅要有鉴别能力,而且要勇于参与批评和抵制,从而提高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促进公众的思考和反省。应通过深入透彻的说理、耐心细致的引导和深入专业的分析,对消极审美乱象进行深入批驳,纠正社会审美偏差。对于那些丑陋的文化现象,我们要保持密切关注,绝不能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而要勇于亮剑发声,为清除文旅融合当中的乱象、树立正确的审美导向,为培育理性平和、昂扬向上的社会心态贡献力量。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分中心特约研究员】

“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自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被提出之后,成为几乎所有大型前沿科技论坛必设的主题。2016年谷歌公司的AlphaGo与围棋世界冠军巅峰对决,让李世石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也让全世界见识了新一波人工智能掀起的巨浪。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虚拟现实、Ghatgpt、自动驾驶、“奇点爆炸”、“超级智能”、“数字永生”等概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AI产业的发展在推动信息化平权革命、社会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也伴随着伦理风险与技术隐患。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组织的人工智能事件监测数据,仅2023年12月,人工智能伦理事件就达495件,伦理问题也反向制约着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要热情拥抱、积极促进人工智能发展,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坚持依法依规的治理方式,平衡好AI产业的社会价值、发展前景和法律伦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发展AI产业。AI技术本身是中立无害的,但技术的中立性并不意味着价值中立。电车难题是一个经典的伦理学思想实验,它探讨了可预见的后果与预期后果在道德层面的比较。在这个实验中,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撞上五个被绑在轨道上的人,而你站在一个可以改变电车行驶轨道的杠杆旁,另一条轨道上只有一个被绑的人。你是否应该拉动杠杆,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在自动驾驶汽车的背景下,电车难题变得更加复杂。不同的伦理理论提供了不同的决策框架:结果主义者认为,应通过任何手段减少整体伤害。义务论者认为,主动拉动杠杆杀害一个人在道德上比让电车继续前行更错误。功利主义者认为,最道德的选择是为最多数人创造最大利益。在人工智能的伦理决策中需要明确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和优先级。以“萝卜快跑”无人驾驶为例。出租车行业鼎盛时期,全国大约有1000万司机,网约车崛起后,大约还剩下不到300万。无人驾驶车辆普及了,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出租车司机将要失去手中“饭碗”。通常,一个出租车司机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家庭,这样看来,就不再单纯是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的问题了。就业是民生之本,保就业就是保民生,如何做出两难选择,对决策者是一场大考。在推进无人驾驶技术运用的同时,有关部门应当先对出租车行业做好调查摸底,做好相应宣传,让更多人有择机转行的思想准备,避免情绪性的对抗;多渠业增加就业机会、开展职业培训,为出租车司机转行创造条件。技术发展最终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要警惕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所造成的职业恐慌,防止形成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垄断,使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不断提高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和可预测性,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安全控制之下,打造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的人工智能技术。

坚持依法依规的治理方式发展AI产业。法治建设要快跟上。这为立法、司法、执法提出了新的命题,也使得法治建设面临着新的空间。从立法看,2024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30年来,我国网络法治建设全面深化。国家网信办《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表明,我国已制出台网络领域立法150余部,搭建起我国网络法治的“四梁八柱”。2024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2023年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元年,国家网信办等7部门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我国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政策规范。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个为GPT大模型立法的国家。2024年,欧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正式通过了全球首个全面的人工智能法律框架——《人工智能法案》。

从实践看,以无人驾驶技术为例,AI技术的快速运用,法律也在加速跟进。2024年6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征求意见稿)》,对涉及自动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行为该如何处理、涉及自动驾驶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如何保障等前沿课题征求意见。2024年6月,《湖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发布,该条例坚持问题导向和“有几条立几条”的原则,填补了湖南数字经济促进方面的法规空白,也为下一步智能驾驶领域立法进行了有益尝试。再从司法执法上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提出了专门的司法执法机构的命题。为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2017年以来,国家先后设立了杭州、广州、北京三家互联网法院,以线上审理为基本原则受理互联网案件。短短几年时间,三家互联网法院受理互联网案件数十万件之巨。可以预见,互联网法院受理案件还将呈现增长态势。下一步,数据确权、数据安全保障、算法安全审查等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为人工智能发展形成正确价值导向和稳定社会预期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副教授】

产业发展中的伦理考量与治理展望

周易茗